臺大歷史學報第30期
2002年12月，頁33~51
2002.8.23收稿，2002.10.3通過刊登
BIBLID1012-8514(2002)30p.33-51

唐曆在東亞的傳播

王　勇*

提　要

中國曆法在東亞的傳播，具有多重涵義及複合影響。然而，學術界過於注重其科學技術的層面，較少論及其政治和文化涵義。事實上，在近代以前，東亞諸國基本襲用中國的曆法，不僅把曆法作為先進的天文知識加以攝取，而且作為「尊奉正朔」的標誌以尋求文化認同。

基於上述觀點，本文在追蹤唐曆傳播日本的過程中，將百濟、新羅、渤海納入視野，以東亞文化聯動為背景探討中國曆法對日本政治及文化的影響。同時在汲取先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點討論下列幾個問題。

（一）中國曆法最初傳入日本的時間及途徑。百濟的曆博士王保孫於五五四年赴日傳授曆法，百濟僧觀勒於六〇二年將曆本並曆法傳授給玉陳，其時百濟使用南朝梁的《元嘉曆》，可知南朝系統的曆法在七世紀前傳入日本。

（二）日本始用中國曆法有六〇四年、六九〇年兩說，前者推測使用觀勒帶來的《元嘉曆》，後者則是《元嘉曆》和《儀鳳曆》並行。筆者以為，六〇四年使用的是傳自百濟的舶來曆本，六九〇年則是根據中國曆經自造的曆本。

（三）《儀鳳曆》之謎。日本沿用了七十三年的《儀鳳曆》，學界普遍認為是《麟德曆》的別稱，但在中國和朝鮮的文獻中找不出證據。根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麟德曆》八，《儀鳳曆》三」的記載，可知兩者卷次不同，推測中國歷史上存在過三卷本的《儀鳳曆》。

關鍵詞：中日關係　遣唐使　東亞　唐曆　曆法　元嘉曆　儀鳳曆　麟德曆

* 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言
一、「正朔本乎夏時」
二、唐曆東傳之軌跡
三、從百濟到日本
四、《儀鳳曆》之謎
結語

引言

日本明治維新後，經歷「歐風美雨」的洗禮，從典章制度到風俗習慣，逐漸「脫亞入歐」，人文景觀發生嬗變。面對傳統的東亞文化圈趨於分崩瓦解，中國的士大夫受到巨大的精神衝擊。

清光緒三年（1877），黃遵憲隨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親眼目睹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上至官府，下及學校，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靡然以泰西為式」。[1]他在《日本國志．天文志》中附記一段與友人的爭論，足證在諸般新政中，改曆最遭物議。

> 余在日本與一友論曆事，余意改曆似可不必。其人以為：「此乃維新第一美政。太陽曆歲有定日，於制國用、頒官祿、定刑律均精核畫一，絕無參差。比之舊曆，便益實多。」余謂：「中、東兩國，沿用夏正已二千餘年，未見其不便。且二國均為農國，而夏時實便於農。奪其所習而易之，無怪民間之囂然異論也。」彼又謂：「此第一時不習耳，日久則習而相安矣。且三代之時，三正疊用，改易正朔乃有國者之常。子不議古人而斷斷於是，不亦拘乎？」余無以難之也。既而其人又謂：「置閏之法，本出於不得已。若不必置閏而歲歲齊盡，其法實精，中國特無人創論及此耳。苟有之，未必不

1 何如璋，〈使東述略〉，王曉秋等點校，《日本日記．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扶桑日記．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岳麓書社，1985），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法也。」余乃舉沈存中用十二氣為一年之說以告之，謂中國特不欲更改，並非無人及此。其人愕眙良久，亦無以應我也。今附錄於此，以塞專尚西法者之口。[2]

黃遵憲對日本的改曆進行委婉的批駁，言語之間尚留有一些餘地，代表著少數開明人士的意見。[3]與黃遵憲同時抵日的副使張斯桂，說話就有些刻薄了。他的《使東詩錄》中有一首〈改正朔〉，嘲笑改曆給社會帶來諸多不便（夾注從略）：

行夏建寅自古傳，陰陽兩曆說多偏。

萬千紅紫乘風信，三五團圞誤月圓。

桐葉添時非紀閏，葭灰飛後即編年。

歲周三百六旬六，春仲如何四七天。[4]

日本改曆之初，確實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不便，在社會上引起某些混亂。闕名《日本雜記》載：「日本曆法向同中國，明治新政並曆法改之，如西洋之不置閏。新曆雖頒，民皆不便。」作者引「法不甚敝，不輕改」之古諺，歎息：「吾不知其二千餘年之曆法，有何敝壞而輕改之也。」[5]

光緒十一年（1885），一位自稱「四明浮槎客」的寧波商人，在《東洋神戶日本竹枝詞》中忿忿不平地說：「移風易俗太荒唐，正朔衣冠祖制亡。」這還算克制的。有位名叫易順鼎的儒生，寫了篇〈討日本檄文〉，對日本的大逆不道，不僅口誅筆伐，似乎還要動刀動槍：[6]

---

2 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1），頁 103。

3 所謂「開明人士」，對待日本的改曆，也還是持批判態度的。如黃遵憲在《日本雜事詩》中的〈舊曆〉指責：「如何數典祖先忘」，〈新曆〉說：「改朔書焚夏小正」，把改曆與「焚書坑儒」扯到一塊。參見王曉秋等點校，《日本日記．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扶桑日記．日本雜事詩（廣注）》，602～603。

4 張斯桂，〈使東詩錄〉，王曉秋等點校，《日本日記．甲午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扶桑日記．日本雜事詩（廣注）》，144。

5 闕名，《日本雜記》，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影上海著易堂本，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第 10 帙，頁 350。

6 易順鼎，《盾墨拾餘》，卷 3。轉引自王曉秋著，《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效冠服於他人，驢非驢，馬非馬。紀年僭稱明治，實愈縱其淫昏。改正妄號維新，且彌滋其污穢。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提倡「文明開化」，事無鉅細皆以西洋為圭臬，改曆只不過是諸多新政中的一項，為何會引起中國文人如此激憤和焦慮呢？

一、「正朔本乎夏時」

秦漢帝國在亞洲大陸的崛起，猶似一輪朝陽高懸中天，使東亞諸國從蒙昧的黑暗中迎來文明的曙光，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文明圈漸露端倪。

秦漢之後，經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東亞文明圈日趨成熟，共同的文化要素加強了相互之間的連帶意識。北宋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命出訪高麗，發現彼地的文明景觀與故國何其相似，於是發出如下感歎：

臣聞：「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儒學，所以美天下之化也；樂律，所以導天下之和也；度量權衡，所以示天下之公也。……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7]

徐兢將正朔、儒學、樂律、度量四者視作文化認同的基準，而置「正朔」於首位。再看盛唐詩人王維，在送別阿倍仲麻呂（唐名「朝衡」，一作「晁衡」）時所吟《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詩序中的一段：

海東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8]

在王維看來，奉正朔、同衣冠、貢方物三者，乃是「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的具體標誌，而猶以「正朔」為三者之冠。此外，《全唐詩》

7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原文電子版），卷 40，頁 1。

8 顧可久注，《唐王右丞詩集》，卷 5，頁 381 上，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漢詩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75 年影正德四年和刻本），第 1 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606）所載林寬〈送人歸日東〉詩，也使用了「正朔」一詞：

滄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
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來。
波翻夜作電，鯨吼晝為雷。
門外人蓬徑，到時花幾開。

此詩中的「日東」指日本還是新羅，學術界仍存爭議。但「波翻夜作電，鯨吼晝為雷」，更似描摹橫渡東海的景狀；唐與新羅交往密切，故「天教阻往來」用於絕域日本也較貼切。

在古代東亞文明圈中，地位如此顯赫的「正朔」，究竟指的是什麼呢？單從詞義來看，「正」指一年之始，「朔」為一月之初；兩字合用，即代指人們根據日月星辰的變化而制定歲時節氣的「曆」。若從文化學的角度來分析，還有更深一層涵義：中國每當改朝換代，往往要重定正朔，頒佈新曆，以此作為皇權的象徵。

歷代帝王開拓疆域與頒佈曆法，兩者相輔相成，表現出統御時空的佔有欲。周邊民族倘若尊奉正朔，即被編入中國帝王支配的時間序列，政治上意味著臣服，空間上則被納入共同的文明圈，經濟上獲准參與朝貢貿易。下面試舉兩個例子。

顯慶五年（660）唐滅百濟，繼而征討高句麗。麟德二年（665）高宗封禪泰山，帶方州刺史劉仁軌領新羅、百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可謂衣錦還鄉，甚得高宗寵遇，擢拜為大司憲。《舊唐書．劉仁軌傳》記其逸聞：

> 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曆日一卷，並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9]

劉仁軌文武雙全，他認為削平百濟之目的，是為了「頒示國家正朔」，其標誌便是「曆日一卷」。唐武德二年（619）始用傅仁均的《戊寅曆》，麟德二年改行《麟德曆》，從時間上推斷，劉仁軌在百濟頒佈的應該是《戊寅曆》。

9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校注本，1975），卷84，27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登極之際（1368），按照傳統的程式，定國號為「明」、改年號為「洪武」、頒曆曰《大統曆》。這部新頒的曆法儘管是元朝《授時曆》的翻版，但開國皇帝的尊嚴迫使他改換名稱。

一切準備就緒，朱元璋遣使分赴四方招諭，以重整東亞世界秩序。洪武初年，高麗、日本、琉球、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三佛齊、瑣里等接踵遣使朝貢，明朝在分封各國王號的同時，各賜《大統曆》以示正朔。

或許可以說，在古代東亞文明圈中，中國帝王的封號與賜曆具有某種相似的意義。換言之，周邊各國使用中國曆法，不僅僅是對科技知識的渴求，而且是以「尊奉正朔」的形式，表現出對中華文明的歸同。

二、唐曆東傳之軌跡

日本自古無曆，《魏略》說：「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江戶時代編纂的《大日本史》亦云：「上古民物淳樸，機智未開，是以曆數占測之術，未聞其有。」

七世紀初日本與隋通交，繼而屢次遣使入唐，試圖以中國為藍本建設律令制國家。大化革新後加快模仿唐制的步伐，六六八年頒佈《近江令》，六八九年施行《淨御原令》，次年持統天皇「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10]從而遵奉中國之正朔，堂堂正正地成為漢字文化圈中的一員。

《元嘉曆》為南朝何承天編撰，劉宋元嘉二十二年（445）頒行啟用。《儀鳳曆》中國文獻不載，一般認為即《麟德曆》之別稱，係唐人李淳風所造，始行於麟德二年（665）。[11]這兩種曆法先後相距二百餘年，但在日本卻並行施用，筆者以為是日本對華關係急速轉型的過渡措施，即從中介百濟汲取南朝文化，轉向直接學習更為先進的隋唐文化。有關

10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東京：岩波書店，1978），卷30，507。

11 吉田忠，〈日本曆法的淵源與演進〉，李廷舉等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問題，後面還將專節探討。

日本頒行曆法不久，先後編撰了《大寶律令》（701）和《養老律令》（718），[12]在中務省下置陰陽寮，兼有唐朝太卜署和太史局的功能，掌管天文、曆法、占卜諸事，其中設曆博士一人、曆生十人。曆博士負責教授曆生，並且於每年十一月一日前預造翌年的曆本，由中務省奉呈御覽，然後分頒諸司官廳。從這一時期開始，日本已有精通中國曆法的專門人才，並據此每年編出實用曆本。

西曆七三四年，入唐留學十八年的吉備真備學成歸國，將唐朝正在施行的《大衍曆經》帶回日本，同時攜歸與此配套的《大衍曆立成》十卷及測影鐵尺等。（《扶桑略記》）《大衍曆》係唐僧一行（本名張遂）所撰，成書於開元十五年（727），二年後正式頒用。這部唐代新曆大概很快被送往陰陽寮，由曆博士進行研讀。七五七年，孝謙天皇敕令曆算生必須學習下列書目：《漢書．律曆志》、《晉書．律曆志》、《大衍曆議》、《九章》、《周髀》、《定天論》。《大衍曆議》十篇，專門探討曆學理論，既然定為曆生的必讀書目，說明至少曆博士已經掌握其中的原理。果然六年後（763），朝廷下令停用《儀鳳曆》，改用《大衍曆》編制新曆，翌年開始施行。

從吉備真備攜歸《大衍曆》到陰陽寮據此造曆，其間整整花費了三十年時間。然而，正當《儀鳳曆》與《大衍曆》在日本實行新舊交替的前一年（762），唐朝已經啟用郭獻之編撰的《五紀曆》，中日之間的曆法時差又大大拉開了。

西曆七七七年，日本派出第十六批遣唐使，擔任准判官的羽栗翼是一位中日混血兒，他於四十三年前隨父東歸，當時年僅十六歲。回到隔別已久的故鄉，羽栗翼盡其所能更新知識。翌年（778）隨遣唐使團歸國後不久，奉命試製「朴硝」（中藥名），旋即昇任內藥正兼侍醫。羽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48。

12 據《續日本紀》，卷2，頁18、24，收入《國史大系》（東京：經濟雜誌社，1906），第2卷，《大寶律令》完成於大寶元年（701）八月三日，翌年（702）十月十四日頒佈諸國。相比之下，《養老律令》完成於養老二年（718），直到天平寶字元年（757）才得施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栗翼入唐的另一項收穫，是將《五紀曆》攜歸獻呈朝廷，並奏云：「大唐今停《大衍曆》，唯用此經。」[13]天皇遂於七八一年敕令陰陽寮依照《五紀曆》造曆。可是因當時「無人習學，不得傳業」，只能繼續沿用過時的《大衍曆》。

一晃又是半個多世紀，曆博士大春日真野麻呂以唐開成四年（839）及大中三年（849）的曆本檢勘依《大衍曆》所造的日本曆本，發現「注月大小，頗有相謬」，於是再次奏請改用《五紀曆》。朝廷的答覆是：「國家據《大衍經》造曆日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14]算是勉強允許《五紀曆》與《大衍曆》並用。

從《五紀曆》傳入日本之年（778）算起，這部唐曆因無人識讀而被封存了約八十年，等到大春日真野麻呂獲准用此造曆時（857），發現實際已經過時。

事隔二年，渤海國大使烏孝慎奉使日本，獻上得自唐朝的《宣明曆》。時任陰陽頭兼曆博士的大春日真野麻呂，抓住這個機會，向朝廷建議停用《大衍曆》和《五紀曆》，頒行唐朝正在使用的《宣明曆》，八六一年此議獲准施行。

徐昂編撰的《宣明曆》，唐朝從八二二年開始啟用，這樣中日曆法的時差又縮小了。可是其後日本再也沒有派出遣唐使，這部《宣明曆》竟在日本行用了八百餘年，直到一六八四年日本啟用自造的《貞享曆》，襲用中國曆法的歷史才告結束。[15]

三、從百濟到日本

傳播到日本的中國曆法，除了前述《元嘉曆》、《儀鳳曆》、《大

13 《日本三代實錄》，卷5，頁89，收入《國史大系》（東京：經濟雜誌社，1906），第4卷。

14 《日本三代實錄》，卷5，頁90。

15 關於唐曆東傳日本，亦可參見王勇，〈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曆法〉，收入蔡毅編，《日本における中國伝統文化》（東京：勉誠出版，2002），202～2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衍曆》、《五紀曆》、《宣明曆》之外，還有唐代曹士蔿編撰的《符天曆》、元代郭守敬所造的《授時曆》、明代元統修訂的《大統曆》等。這些曆法的傳播經緯，大抵有文獻資料可作稽考，唯獨《元嘉曆》與《儀鳳曆》似乎「來路不明」。

前面已經提到，持統天皇四年（690）「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這段文字並不意味兩種曆法同時傳入日本，也不能據此斷定是從中國直接傳入日本的。事實上，百濟與日本的曆法交流，可以追溯到六世紀中葉。

據《日本書紀》欽明天皇十四年（553）六月條載，與新羅爭城奪地的百濟向日本求助援兵，欽明天皇從其請，但作為回報，要求百濟輸送技術人才：

> 遣內臣（闕名）使於百濟……別敕：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當相代年月，宜付還使相代。又卜書、曆本、種種藥物，可付送。[16]

從行文分析，是年正值諸博士交班輪換，則百濟向日本輸送博士，必定肇始於此前。第二年二月，百濟依約選派十九位學有專長的博士和身懷特技的工匠赴日，其中包括「曆博士王保孫」。

帶有「博士」頭銜的高級人才，當時在百濟也非常緊缺，常常遣使中國南朝請求下賜。比如，《梁書．百濟傳》記載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百濟使節二次朝貢梁朝，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招聘博士：

>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並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畫師等，敕並給之。[17]

一些學者注意到當時東亞的歷史背景，推斷百濟所貢的博士及工匠多為南朝人。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但從「王保孫」等漢式姓名判斷，他們即使不是南朝人，至少也是寓居百濟的漢人。因為，《日本書紀》在標

16.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卷19，105。

17 姚思廉，《梁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原文電子版），卷59，頁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外國人名時自有分寸：凡漢族直接使用原來的漢字，韓族則多採用標音漢字（如「己麻次」、「進陀」等）。

六世紀中葉，百濟境內居住著許多來自中國的漢族移民，他們擁有較高的文化，醫學、易學、曆學等高深的學問，正是漢族移民馳騁才華的領域，土著韓人一時無法涉足。

王保孫赴日後的行跡不見史載，既然擁有「曆博士」的頭銜，必定精通天文學和數學，但是他所掌握的這門玄奧學問，恐怕僅能作為皇室的點綴，當時的日本尚無條件加以傳習。正如黃遵憲在《日本國志．天文志》中所云：

> 當時曆博士征之百濟，依番上下，第襲用漢曆而已，未嘗習學其術也。[18]

然而事隔半個世紀，博學多才的百濟僧人觀勒自西渡海東來，在日本曆法發展史上掀開嶄新的一頁。《日本書紀》推古十年（602）十月條載：

> 百濟僧人觀勒來之，仍貢曆本及天文地理書並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以裨學習於觀勒矣。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19]

觀勒身為出家之人，不僅深諳天文、地理之術，而且精通道教和玄學，所以受到日本朝廷重用。師從觀勒學習曆法的是一位名叫「玉陳」的移民後裔，據說他「學以成業」，那麼意味著日本總算有了通解曆法的傳人。

日本推古元年（593）四月，皇太子聖德太子任攝政，推古女帝以萬機悉委之。聖德太子以大隋帝國為藍本，推行一系列內政外交的改革。他大概意識到曆法作為文明標誌的重要性，觀勒乍到即聘為曆學之師，二年後（604）的正月倉促「始用曆日」。[20]

我們注意到，關於日本最早使用曆日，《日本書紀》說是持統四年

---

18 黃遵憲，《日本國志》，頁100。

19 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卷22，178。

20 《政事要略》，《改訂史籍集覽》第29冊（鏃倉：史籍集覽研究會，1969），頁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90），《政事要略》則作推古十二年（604），兩者相距八十六年。一般而論，日本學術界比較重視前者，對後者多持懷疑態度。[21]

然而，聖德太子「始用曆日」也未必無據，一是這條記事與觀勒傳來曆本、玉陳習學曆法前後貫通，形成一個完整的時間系列，包涵合理的來龍去脈；二是頒曆之舉與前後事件有機關聯，如施行《冠位十二階》（603）、頒佈《憲法十七條》（604）、派出遣隋使（607）等，將頒曆置於聖德太子施政的大背景中加以觀照，那無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探討王保孫、觀勒從百濟攜帶而來的「曆本」究竟為何？六世紀前後，百濟實際使用中國南朝的《元嘉曆》，這在《周書・百濟傳》中有明確的記載：

> 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為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22]

百濟從南朝梁招聘博士、工匠，散見於《梁書》、《陳書》等，而《元嘉曆》早在劉宋時（420～479）就已傳入百濟，並且被一直襲用到百濟亡國（661），說明百濟與南朝在文化上具有很深的淵源關係。

王保孫和觀勒均來自百濟，他們所傳授的應該是百濟正在使用的曆法，黃遵憲《日本國志・天文志》斷言「觀勒所獻乃宋何承天之《元嘉曆》」，應該是可信的。既然王保孫和觀勒攜帶而來的是《元嘉曆》，那麼玉陳師從觀勒傳習的必是《元嘉曆》，聖德太子於推古十二年（604）施行的自然也是《元嘉曆》。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曆法」，嚴格地說應該分成兩種。一種是一年一換的實用曆，習稱「曆本」或「曆日」；另一種叫做「曆經」或「曆議」，是根據長期觀察天象總結出來的理論公式，每年的實用曆本便是據此編造的。

日本歷史上出現兩次「始用」曆法，這究竟該如何解釋呢？筆者以

---

21 吉田忠，〈日本曆法的淵源與演進〉，47。

22 令狐德棻等，《周書》，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原文電子版），卷41，頁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第一次聖德太子「始用」的《元嘉曆》，應該是實用的「曆本」（《政事要略》作「曆日」），時距觀勒抵日僅僅二年，日本還不具備自己造曆的能力；第二次持統天皇「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大概已經依據「曆經」編制出本國的「曆本」，因而使用了「始行」的措辭。[23]

四、《儀鳳曆》之謎

持統四年（690），日本經過「大化革新」（645），律令體制漸趨完備，天皇下詔啟用《元嘉曆》和《儀鳳曆》，用意顯然在於融入東亞共享的時空世界。這一舉措與推古朝「始用曆日」具有本質上的區別：頒曆不再是一種時尚追求或獵奇行為，而成為一種政治策略及文化取向。自此，中國曆法成為日本典章制度及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日本的文明進程也因此而被精確地鐫刻在東亞史冊之中。

長期以來，人們對新舊兩曆並用感到疑惑不解，提出過種種猜測。江戶時代後期，藤田一正在《元嘉曆草》序文中指出：

> 以元嘉曆法測算推古十二年至持統五年干支，皆一一吻合。然至持統六年，則十一月辛卯朔與《元嘉曆》差一天，若用《儀鳳曆》即合。[24]

按照藤田一正的說法，《元嘉曆》從推古十二年（604）用到持統五年（691），至持統六年（692）十一月為《儀鳳曆》所取代。翻檢《日本三代實錄》，有「始用《元嘉曆》，次用《儀鳳曆》」的記載，或可視為旁證。

推古十二年（604）至持統五年（691）期間，《元嘉曆》是否一直在使用，很值得懷疑；《元嘉曆》與《儀鳳曆》並用之說，也需斟酌一番。《元嘉曆》採用平朔，《儀鳳曆》依據定朔，計算時間的方法既不

---

23 七世紀末日本有無造曆能力，目前尚無確鑿的證據。不過在六九〇年之前，日本已經有了陰陽寮和占星台，《日本書紀》（卷29）天武天皇四年（當白鳳三年，675）正月條出現「陰陽寮」和「始興占星台」的記載，說明日本具備了造曆的技術條件。

24 轉引自能田忠亮，《曆》（東京：至文堂，1957），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也就難以和平相處。

近年，一種折衷意見比較受人關注，內田正男在《日本曆日原典》[25]中最早提出：持統六年（692）至文武元年（697）依然以《元嘉曆》為主，所謂「兩曆並用」，是指月朔按《元嘉曆》計算，日食則依《儀鳳曆》預報。[26]

雖然這個問題還無法獲得終極解決，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嘉曆》和《儀鳳曆》有過一個並用及過渡的過程。日本在採納新曆時，為了顧及傳統，往往允許舊曆繼續沿用某個時期，《元嘉曆》和《儀鳳曆》並非孤例，《大衍曆》與《五紀曆》的情況亦如此。

《元嘉曆》和《儀鳳曆》的新舊交替，折射出這一時期日本文化面臨轉型的世相。亦即，日本在完善律令制度的過程中，從中介百濟轉向與中國直接通交，從汲取南朝文化轉向以隋唐為楷模。因而啟用南朝舊曆，採納唐朝新曆，無疑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然而，出乎人們預料的是，在日本正式頒行，且施用七十餘年之久的《儀鳳曆》，在中國卻找不到同名的曆本。歸納諸家之說，大致有以下幾種解釋：其一，《儀鳳曆》即《麟德曆》的別稱，因儀鳳年間傳入日本，故名；其二，《麟德曆》在儀鳳年間傳至新羅，彼地俗稱《儀鳳曆》，日本從新羅得之，遂襲其名；其三，《大日本史．用曆次第》提出一種見解，認為《麟德曆》在儀鳳年間曾一度改稱過《儀鳳曆》。目前，第二種觀點的支持者最多，如李廷舉教授斷言：

> 日本人之所以稱麟德曆為儀鳳曆，有其歷史上的原因。如前所述，較早傳入日本的元嘉曆是來自百濟；這是因為，飛鳥時代日本與百濟的關係比較親密。而到持統帝時代，新羅已經統一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於六六八年統一）。此時，唐朝已實行新曆即麟德曆。這個麟德曆是在唐儀鳳年間傳入新羅，故名之為儀鳳曆。後來它又經由新羅傳入日本，日本就仍沿用新羅的名

25 東京：雄山閣，1975。

26 吉田忠，〈日本曆法的淵源與演進〉，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稱，謂之儀鳳曆。[27]

這種代表中日學術界主流的觀點，其實陷入一個巨大的誤區：《儀鳳曆》並非儀鳳年間傳入新羅。據朝鮮史籍《三國史記．新羅本紀》文武王十四年（674）正月條載，入唐宿衛的德福傳習曆術而歸，是年新羅改行新曆。[28]這部「新曆」無疑就是《麟德曆》（中國使用的時期是665～728），事在儀鳳年之前，「新羅命名說」不能成立。

至於第一種意見即「日本命名說」，縱觀日本採納中國曆法的歷史，都盡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絕無擅自改名的類例。而且，日本於持統四年（690）採用《儀鳳曆》時，已是儀鳳年間之後，為何特意用「儀鳳」之舊年號改稱《麟德曆》呢？目前還無法對此作出合理解釋。

《大日本史》之說看似牽強，卻未必無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九世紀末）載有「《麟德曆》八，《儀鳳曆》三」，可知日本確實有過《儀鳳曆》，且卷次與《麟德曆》不同，似乎不像是新羅或日本的俗稱。

唐代頒曆甚頻，《新唐書》舉出八部。其中《光宅曆》與《景龍曆》屬於換湯不換藥，如《舊唐書．曆志》云：「天后時，瞿曇羅造《光宅曆》；中宗時，南宮說造《景龍曆》，皆舊法之所棄者，復取用之。徒云革易，寧造深微，尋亦不行。」[29]

可見以年號命名的上述兩曆均未正式行世，《儀鳳曆》的情況是否類似呢？即儀鳳年間曾將《麟德曆》改頭換面而稱之《儀鳳曆》，或許在某種範圍內短期流通過，因為內容無甚創新復又啟用《麟德曆》。[30]這種可能還是存在的，如韓穎所造《至德曆》就有過這樣的經歷。[31]

---

27 李廷舉，〈中國天文曆法的東傳〉，李廷舉等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7。

28 金富軾，《三國史記》（漢城：景仁文化社，1982），卷7，頁82。

29 劉昫等，《舊唐書》，卷32，1152。

30 還有一種值得參考的意見，即認為《儀鳳曆》就是《麟德曆》的節本，史書在計算唐代曆書時未單獨列出，而日本則取其節本行用。

31 《新唐書．曆志》三下云：「至肅宗時，山人韓穎上言《大衍曆》或誤。帝疑之，以穎為太子宮門郎，直司天臺。又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曆》，起乾元元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儀鳳曆》傳入日本的途徑，中外學者多認為是來自新羅，根據是儀鳳年間中日無聘交，而新羅與日本頻繁通使。不過，迄今為止未在朝鮮文獻中發現《儀鳳曆》之名，則新羅傳入說不能視為定論。

然而，日本佛教史籍《三國佛法傳通緣起》有關入唐僧道光的記載，或許能為我們揭開《儀鳳曆》之謎提供一些新的線索。據載，六五三年隨遣唐使吉士長丹入華的道光，留學二十五年後於儀鳳二年（677）九月十九日離唐歸國。道光專攻律宗，曾攜歸大量佛教書籍，並撰有《四分律抄撰錄文》一書。[32]在道光歸國的行囊中，是否夾帶著一部《儀鳳曆》呢？

我們期待著新史料的發現，目前只能作出上述推測而已。

結語

通過上述考論可以發現，從七世紀初至十七世紀末的千餘年間，日本先後襲用《元嘉曆》、《儀鳳曆》、《大衍曆》、《五紀曆》、《宣明曆》等，一部日本文明發展史處處留下中國曆法的痕跡，而尤以唐曆的影響最為深遠，體現了日本汲取中國文化的鮮明特徵。

不過，我們也必須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亦即日本的曆術水準嚴重滯後，掌握一部新曆往往需要花費幾十年時間，跟不上唐曆發展的步伐。唐代的《宣明曆》在日本一直襲用到清代（長達八百餘年），意味著五代、宋、元、明的曆法成果未被日本吸納，這從兩國文化交流的整體上看也是很不正常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大概有以下兩條：

其一，遣唐使制度廢止（894）以後，兩國的交往由政府轉為民間，像曆經這類由國家直接控制的書籍，很難通過民間途經流出海外。當然，這不包括實用曆本，如曆博士大春日真野麻呂，曾以唐開成四年（839）、大中三年（849）之曆本檢勘《大衍曆》，發現月之大小有誤；

用之，訖上元三年。」

32 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下；參照茂在寅男等著，《遣唐使研究と史料》（東京：東海大學出版社，1989），185～1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如後晉天福二年（937），朝廷命大宰府抄送當年與明年的唐朝曆本，事雖未成，但說明往來海途的商人或僧侶可以將曆本帶到日本。

其二，曆博士基本被賀茂等幾個家族世襲壟斷，由於是家傳的學問，所以少有競爭者，長此以往便不思進取，趨於封閉和保守。《續日本後紀》記載了一則頗為典型的例子：承和五年（838）最後一次遣唐使出發，入選使團的曆請益生刀岐雄貞、曆留學生佐伯安道、天文留學生志斐永世等，因為畏懼海途危險，居然在起航前偷偷逃跑，結果被判斬刑，罪減一等配流佐渡島。隨此次使團入唐的有圓仁、圓載、圓行等，與他們冒死求法的精神相比，真可謂天壤之別。[33]

儘管現在東亞諸國普遍使用西方傳入的太陽曆，但在曾經深受唐曆影響的地區，如朝鮮半島和日本，陰曆（農曆）的痕跡不僅永久鐫刻在歷史中，而且還活生生地滲透在日常生活裏。

中國曆法東傳略年表（初稿）

西曆	中國年號	日本年號	關 連 事 項
554	承聖三	欽明十五	百濟派遣曆博士王保孫赴日。
602	仁壽二	推古十	百濟僧觀勒攜《元嘉曆》赴日，並向玉陳傳授曆法。
604	仁壽四	推古十二	聖德太子始用曆日（《元嘉曆》）。
674	咸亨五	天武三	德福自唐攜歸《麟德曆》，新羅據此頒佈新曆。
675	上元二	天武四	日本始興占星台，此前已設陰陽寮。
678	儀鳳三	天武七	留學僧道光自唐而歸，可能帶回《儀鳳曆》
690	天授元	持統四	持統天皇始行《元嘉曆》和《儀鳳曆》。
692	長壽元	持統六	日本停用《元嘉曆》，施行《儀鳳曆》。
718	開元六	養老二	日本在陰陽寮置曆博士和曆生。
734	開元二二	天平六	吉備真備自唐攜歸《大衍曆》。
757	至德二	天平寶字元	日本將《大衍曆議》定為曆生必讀之書。

33 《續日本後紀》，卷8，頁255，收入《國史大系》，第3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63	廣德元	天平寶字七	日本停用《儀鳳曆》，施行《大衍曆》。
778	大曆十三	寶龜九	羽栗翼自唐帶回《五紀曆》。
780	建中元	寶龜十一	羽栗翼建議朝廷改用《五紀曆》。
781	建中二	天應元	光仁天皇敕命依《五紀曆》造曆，然事未果。
822	長慶二	弘仁十三	渤海國始行《宣明曆》。
856	大中十	齊衡三	曆博士大春日真野麻呂奏請採用《五紀曆》。
857	大中十一	天安元	日本並用《大衍曆》和《五紀曆》。
859	大中十三	貞觀元	渤海大使烏孝愼抵達日本，進獻《宣明曆》。
861	咸通二	貞觀三	日本據大春日真野麻呂奏請，採用《宣明曆》。
937	天福二	承平七	朝廷命大宰府抄送當年與明年的唐朝曆本。
957	顯德四	天德元	天台僧日延自吳越國攜歸《符天曆》。
1078	元豐元	承曆二	宋司天監調查遼、高麗、日本的曆本。
1303	大德七	嘉元元	高麗使用《授時曆》。
1369	洪武二	正平二十四	明太祖賜高麗《大統曆》。
1371	洪武四	建德二	明太祖賜日本使祖來《大統曆》。
1625	天啟五	寬永二	日本試用《授時曆》。
1684	康熙二十三	貞享元	日本施行自創的《貞享曆》。

*本文初稿曾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2002年6月26~28日，臺灣大學歷史系。

（責任編輯：葉泉宏　校對：汪正晟　蔡虹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ang Calendar in East Asia

Wang, Yong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alendar in East Asia has its multifold significance and the compound influence.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however, long over-emphasized its effect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while unduly underestimating it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portance. As a matter of fact, before modern times, the Chinese calendar was adopted by nearly every country in East Asia, not only as a way of learning advanced astronomical knowledge, but, more importantly, as a symbol of their compliance with orthodox calendar to seek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viewpoin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exerted upon Japa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by the Chinese calendar in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linkage in East Asia, while tracing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ang calendar in Japan, with Baiji, Xinluo, and Bohai also brought into the study. Meanwhile, in the light of the achievements already made by my forerunners, I will focus particularly on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 The earliest time in, and the initial approach through, which the Chinese calendar was disseminated into Japan. In A.D.554, Wang-Baosun, a doctor of calendar in Baiji, set out for Japan to impart knowledge about calendar, and in A.D.602, Guanle, a monk in Baiji, passed the almanac, together with calendar (*Yuanjia Li* from the Liang State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y), to Tama-furu, which testifies to the fact that even before the 7th century, the systematic calendar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had already been imported into Japan.

II. There are two sayings concerning the time when Japan began to adopt the Chinese calenda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of *Yuanjia Li* by Guan Le in A.D.604; another is the simultaneous importation of *Yuanjia Li* and *Yifeng Li*. Personally, I believe that the calendar used in 604 was the one introduced from Baiji, while the one used in 690 was made natively by Japanese on t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檢索

basis of Chinese calendar.

III. The enigma of *Yifeng Li*. For a long period of 73 years, Japan had followed *Yifeng Li*, which, a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by academics, is the alternative name for *Linde Li*. Yet, no evidence has ever been found in both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s to prove this hypothe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rd in the chapter '*Linde Li* the Eighth Volume, *Yifeng Li* the Third Volume' in "Nihonkoku Genzaisyo Mokuroku", the two calendars actually belonged to different volumes, and there might have been three volumes of *Yifeng Li* i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Qiantangshi, East Asia, Tang calendar, calendar, *Yuanjia Li*, *Yifeng Li, Linde L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